



20世纪80年代，学校历届老领导合影。（右起：刘少俊、李润玉、徐盼秋、曹漫之、宋子成、吕书云、魏文伯、魏文伯夫人、郑文卿、赵振德、徐盼秋夫人）

从华政筹备处此前办公地点可见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哪怕新成立高校也大多要在一些老校园里选址。比起暨南大学二院、立信会计学校等地来，华政最终选择在苏州河畔的圣约翰大学旧址开办，何勤华认为是“英明之举”。“从此，华政的名字，华政的命运，就和‘万航渡路1575号’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”

从相关档案来看，华政校址的选择，与第一任院长魏文伯拍板决定有关。1949年5月24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，是日深夜至25日凌晨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带领华东局机关和接管干部，由江苏丹阳转乘火车、吉普车抵达苏州河畔的圣约翰大学，进驻校内交谊室，亦即日后的交谊楼。此地，成为“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”。魏文伯随陈毅司令员，与饶漱石、张鼎丞、曾山、潘汉年、刘晓、舒同同时抵达此地。也因此对圣约翰大学校园印象深刻。

在1952年9月25日筹备处搬迁到圣约翰大学旧址后，各路学生于10月开始前来报到，包括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安徽大学、震旦大学、东吴大学、上海学院这六校的法律系，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、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，以及沪江大学的社会学系学子。1953年9月，厦门大学法律系也并入华政。

1952年10月，华政的教员已经达到了54名，加上87名职员，工警106名，学校教职员总数为247人。其中，民国年间较为

知名的法学家李良、刘焕文等转到华政，又吸收了如傅季重、浦增元等刚从院校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。可即便如此，在工作人员方面仍有短缺。

作为建校后的第一批学生，今年已88岁“米寿之年”的功勋教授徐建仍记得报到后第一时间就被派往沪江大学图书馆，从事图书接收工作。“我当时的任务是这样的——在沪江大学图书馆看书架上的书，只要我觉得是未来华政需要的书，就从书架上抽出来一点，之后就不用管了。过了几天，华政筹备处又派来一个人和我搭档，他说会派人来搬运。”徐建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“当时我只是一名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二年级的学生，虽然也学了一些专业课，可实际上还是挺幼稚的。我只顾将一些法律、政治类的图书抽选出来，其他就不管了。”类似徐建这样从复旦转入华政的学生，当时还有卢莹辉、胡绿漪等。还有南京大学转入的陆锦碧、钱英、方晓升等50余人。当然，还有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社会上的失业工人中招收的学生。

在11月15日于交谊室举行的华东政法学院首届开学典礼上，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匡亚明、组织部胡立教等有关领导到会祝贺。魏文伯院长不仅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更献诗一首。最后一句“在这美好的园地上，让我们做一个善良的园工，勤劳地耕作、培养，用美满的收获来酬答人民的期望”，道尽了华政第一代师长的目标。

作为华政的首任院长，魏文伯实际上一直是兼任院长，特别是1955年调任司法部副部长、党组书记，并参与中央政法干部校的建设后，以及回到上海担任市领导以后，对华政具体事务的主理，主要落在了郑文卿身上。当然，两位开校元勋对华政的感情是同样深厚的。1957年12月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曾到华政，作题为“从司法改革问题谈起”的报告，并勉励华政师生做又红又专的政法人才。

在华政建校初期，郑文卿就主抓教研室章程的制定，并大抓专业课教学，聘请华东与上海地区政法、工商、税务有关方面主要领导，来院系统讲述有关理论、法规、政策。

70[®] ECUPL
1952-2022

“在这美好的园地上，让我们做一个善良的园工，勤劳地耕作、培养，用美满的收获来酬答人民的期望。”

